

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以创刊初期的《申报》为例

黄旦

摘要 雅集，是指《申报》创办之初所刊载的大量诗歌酬唱。围绕这一现象，研究从报纸谋业与文人谋友的耦合；古近体诗和竹枝词的报纸交织显示的文人“身”“心”之纠缠；报纸对诗人阅报投稿习惯的培育，以及促发了“得缀报尾为荣”的浮风三个方面，揭示报纸“雅集”如何重组文人关系，形成报纸公共文化的交往新方式，引导他们逐渐接受报纸和印刷产业，从而萌发脱离以往生活轨道的取向。进而认为，报纸“雅集”改造了传统文人乃至传统社会的文化习性，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和文化生产机制，并构成以报纸为中介的社会新形态。报纸“雅集”是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也标示着整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种启动。

关键词 申报 雅集 晚清 传统文人 现代启步

作者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54）。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5-0194-14

引言

《申报》一出世，就热切召唤“骚人韵士”提供“短什”“长篇”，引来“无量数斗方名士，纷以词章相投”。^①其中绝大部分为相互酬唱之作，为方便研究计，本文称之为报纸“雅集”。

雅集者，乃传统中国文人以诗会友欣赏诗艺的一种仪式，参与者多诗朋酒侣，有明显的地域和个人色彩。那么，当晚清因故流入上海的“斗方名士”与一个城市的公共媒介，以“雅集”的形式相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文学研究者对此着力最多，且不乏全面和深入之作。^②他们大多将此视为一种文学现象，重点是传统诗歌在报纸上的刊载过程及其现代转变。报纸的产生与文学无干，二者生出的枝蔓，是相互利用也是相互成就，但一切以适应报纸特性为基础。因此，报纸应是诗歌的基体，不是诗歌的载体；报纸诗歌亦非报纸上的诗歌，而是报纸化的诗歌。至于文学，按鲁迅所示，我国的新派“文学”来自日本输入的“literature”，不是“文学

①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载《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83—84页。

② 如花宏艳：《〈申报〉刊载旧体诗研究（1872—1949）》，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花宏艳：《〈申报〉的文人群体与文学谱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陈璇：《继承与革新：早期〈申报〉所载旧体诗词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何宏玲：《〈瀛寰琐记〉与近代文学风气的转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何宏玲：《〈申报〉与近代上海早期文人群体意识的形成——以“聚星吟社”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有所不同的是张天星的《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该书就报刊对于晚清文学变革的影响做了细致和全面的研究，不过有矫枉过正之嫌，似乎文学现代化就源自报刊的单向驱动。

子游子夏”一脉的延伸。^①老“文学”和新“文学”的相互纠缠，直至20世纪头二三十年，仍然错综复杂难分难解。^②依此，其更合适的问题也应是新媒介拥抱旧诗词，创造出什么新的“文学”，而不是似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文学”，在报纸“河道”中流着流着就自然而然地由传统而现代。进一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诗歌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种生活和交往的方式，关涉士人与非士人的一种判定基准，^③是需要立足生命价值，从对个人尊严的支持，使生活富有意义和完满^④的角度来考察。以此，称“雅集”为诗人通过自己的智慧思想所创建的一块“城市山林”^⑤，倒是不乏见地。不过其根基不是“思想”，诗词也不是自足的“专属”园地。报纸“雅集”是“诗歌”之“集”，也是文人、报纸和城市的交集。基此，本文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这一过程重新发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对于报纸，对于传统的诗歌酬唱、文人交往以及城市社会的演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今日忽传有《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⑥

在“忽传”中落地的《申报》，其宗旨简单而明确，就是卖报，以“营生为计”^⑦。问题是，这种“卖报”的行当当时中国人不陌生但也没有好感。^⑧从出场的第一天起，报馆在一版论说位置，几乎天天在做自我介绍，^⑨持续一月之久，不是没有缘由的。在创办当日所昭告的《本馆条例》中，“骚人韵士”被列在报纸售卖价格之后，诗歌的征集与言论、广告价码、轮船航期、招人卖报等等杂糅一起，足以显示“骚人韵士”——作为潜在的读者和作者，与这一切一样，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报馆“营生”之资源，而不是为了什么“文学”。

与稍迟出版的《瀛寰琐纪》不同，报纸瞄准的不是“文坛健者，儒林丈人”，预想的“赐顾观看”者也不是“士君子”，而是要将“四方君子”——“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⑩一网打尽。“首列议论，中述琐细，后刊京钞，尾缀拍卖行情单”，^⑪以适应不同人群口味，成为版面基本构想。报刊史家认定，这是后来中国报纸“言论、新闻、副刊、广告”之四分的根源，^⑫可是却没能进一步揭示其意义。版面如脸面，一笑一颦皆有意。当《申报》以“事之大小，皆可载入，即一器一物一言一动之微，靡不兼收并蓄”，划出“新报”与中国“邸报”的区别时，实也就抹去了原有的社会分层。邸报“所载皆朝廷之政治”，本是为仕宦

①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4—110页。所以有研究者言，清朝中期文学的情形与如今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本就不是一回事（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26页）。也有研究者指出，从谱系的角度，现代中国的“文学”之新，缘于点多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635年杨廷筠的《代疑续编》。[参见李爽学：《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张治译，载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台北：麦田出版，2021年，第57—62页]

②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③ 吉川幸次郎：《士人的心理与生活》，转引自王标：《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07页。

④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⑤ 陈璇：《继承与革新：早期〈申报〉所载旧体诗词研究》，第142页。

⑥ 嘉门晚红山人：《续沪江竹枝词二十首》，《申报》1872年9月28日（同治壬申八月廿六日）。

⑦ 《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1875年10月11日。

⑧ 据姚公鹤，当时社会普遍将报纸与朝报相提并论，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者为塘驿杂役，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故社会轻之。（姚公鹤：《上海闲话》，吴德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陈伯熙的《上海轶事大观》亦记载：《申报》刚创办时，除了订购长年的洋行和一些华商，“剩余报纸逐日雇人挨户分送，受者亦不欢迎，甚有厉色峻拒者，比月终收取报资多寡不计，唯唯承颜，几同沿门托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⑨ 第一、二、三号：《本馆告白》《本馆条例》；第四号：《申江新报缘起》；第五号：《招刊告白引》；第六号：《本馆自述》；第十一号：《本馆告白》；第十三号：《本馆告白》（一直刊载到第二十三号）；第十七号：《本馆自叙》；第二十四、二十五号：《采访新闻启》、关于京报转载和货物行情的调整说明。

⑩ 《本馆告白》《刊行〈瀛寰琐记〉自叙》《新译英国小说》，《申报》1872年4月30日（壬申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10月11日（壬申九月初十日）、1873年1月4日（壬申十二月初六日）。说明：自1874年6月15日（同治甲戌五月初二日）开始，《申报》标注公历出版时间，因此，凡此后的报纸引用，均只注公历。

⑪ 《与申报馆论申报格式鄙见》，《申报》1875年3月13日

⑫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

所设,突出的正是其高人一等。如今,新报让“考时事之盛衰”与“释一时之愁闷”“并行而不相悖”,所谓的“士农工商”统统化为“阅者”,聚合成了一个“无差序格局”的新群体,有教养文化的固有独立性和对美学的等级划分无形中也就被“营生”的取向所摧毁。^①《申报》正是由此为后来的报纸版面安排提供了示范,在“无心插柳”中对报业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②尽管《申报》遮遮掩掩说,这不过是“微变其例而其意则同”。^③

“纷以词章相投”的文人,绝大部分是因躲避兵燹于 1860 年代涌入上海。其时上海,北为租界,南是县城。租界在构造和气质上与中国传统城市完全相异。异质意味陌生,这些文人进入“中外商民相角逐”^④的陌生之“夷场”,在文化和生活上,也就断去原有根基。称“风余两袖,仰磋茅屋,罄县四壁,拥笑书城”,^⑤或有艺术性夸大,但生计成问题应是不假:“寒衣未寄催刀尺,粒食难谋乞稻粱”;^⑥“谋生计拙天应怜”,“簞瓢犹在莫求仙”。^⑦“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何,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如群蚁之附膻”。^⑧其间的辛酸苦楚唯亲历者自知:“间为人镌印,必以秦汉为规模,然所得甚微,炊烟仍屡断,中岁有贾人子延习笔札,市廛溷迹,益复无聊”。^⑨“琴剑自怜孤客况”,^⑩《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的这一声叹息,应就来自这样的切身之痛。

“书之朋侪琴剑是”。^⑪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随身之物,琴剑征示刚柔相济之风骨。“琴剑自怜”,表明蒋芷湘对自己的身份念念不忘。蒋生于 1842 年,祖籍安徽,后迁居杭州。他如何到上海的具体过程不清,或许和他曾就学于“敬业书院”^⑫有关。蒋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均是读书人且做过低级的官员。^⑬此种出身,却落入“鰥生艰旅食,齟齬到斯文”^⑭之“孤客”,足见其“琴剑自怜”是物质贫瘠亦是一种精神饥饿:“宵冷荒鸡一倍酸,铁衾孤拥感无端”;“一襟愁话诉谁知,静对冰荷冷不支”。^⑮《申报》另一主编钱昕伯称,其先人之敝庐“付狂寇一炬,仅存遗址,饥驱四方,视逆旅如乡里”。^⑯同样做过《申报》主笔的黄协埙,想到琴剑更为不堪:“一琴一剑一行藤,辛苦饥驱卅载曾,射虎短衣聊自壮,依人长铗愧无能”。^⑰

虽然经济状况未必直接等同于当时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⑱,但离土去根的精神创伤总是存在。以此看,“短什长篇”之请,得到“纷以词章相投”,于报纸而言固为之营生,对于“斗方名士”,则源自另一重动力,那就是“读者和作者差不多共有的精神风气”^⑲——“琴剑自怜”的“孤客”感,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一把

① 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② 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s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对《申报》所具的中国特色做了很好的概括,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重要的方面。

③ 《书中西闻见录后》,《申报》1872年9月26日(壬申八月廿四号)。

④ 琴阁居士:《申江行》,《申报》1872年8月3日(壬申六月廿九日)。

⑤ 古越高昌寒食生:《奉题黄子慎世伯归诗图即请正拍》,《申报》1881年10月1日。

⑥ 鹤槎山农:《寒鸦消寒第四集》,《申报》1873年2月10日(癸酉正月初三日)。

⑦ 鹤槎山农:《集感十首》,《申报》1873年7月3日(癸酉六月初九日)。

⑧ 《师说》,《申报》1872年8月17日(壬申七月十四日)。

⑨ 《揖竹词人吟草·序》,转引自何宏玲:《〈申报〉与近代上海早期文人群体意识的形成——以“聚星吟社”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⑩ 蘅梦庵主:《壬申长至日同人作消寒雅集于怡红词馆漫成二律用索和章》,《申报》1872年12月25日(壬申十一月廿五日)。

⑪ 李士棻:《谢丁恬生赠琴》,载李士棻撰,唐清莲、唐德正注:《天瘦阁诗半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⑫ 郭国义:《〈申报〉初创:〈地球说〉的作者究竟是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⑬ 邵志泽:《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5期。

⑭ 剪淞病旅:《同社诸君招饮江楼作消寒第一集》,《申报》1875年1月25日。据花宏艳所考,“剪淞病旅”即为蒋芷湘的另一个笔名,参见花宏艳:《〈申报〉的文人群体与文学谱系》,第128—152页。

⑮ 蘅梦庵主:《岁暮感怀》,《申报》1873年4月17日(癸酉三月廿一日)。

⑯ 转引自陈璇:《继承与革新:早期〈申报〉所载旧体诗词研究》,第166页。

⑰ 转引自杨誉:《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埙》,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89页。

⑱ 费南山:《19世纪中国新学领域的社会活动家》,载朗宓榭、费南山主编:《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上),李永胜、李增田译,王宪明审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⑲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李冠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

抓住了伸过来的报纸：“座上新知与故知”，“萍梗相逢岂预期”。^①

《申报》是在第十五号报纸上，首次大规模推出诗歌，《沪北竹枝词》和《续沪北竹枝词》充塞了其大半个版面。现无法探知其运作过程，但谋划的痕迹还是隐约可寻。先是第二号上刊出《观西人斗驰马歌》，既为第一号上《驰马角胜》报道的延续，也是刊登诗词的一个示范。第十、十二号出现了读者来信，报纸有了初步反响。第十三号报纸在头版刊出一个新告白，旨在鼓励买报，但也不忘催促诸君子：“或降玉趾以接雅谈，或借邮筒以颁大教”。^② 随后，袁祖志以“海上逐臭夫”和“忤情生”为名的这两篇“竹枝词”登场。^③

报馆首选竹枝词且让这样一个人出来打头阵，同样不是偶然。竹枝词是写实的，颇似于新闻报道，这不仅切近报纸特性，而且比之古近体诗，显然更能让“四方君子”“娱阅”。袁祖志为随园老人袁枚之孙，躲避战乱由金陵到浦江，于《申报》创办时，已居此近二十年。^④ 名家之后且又是“老上海”，这不仅使得他熟悉申江，而且在文人圈里应也早有知名度。^⑤ 这番谋划证明是成功的，证据是不久在报纸的广告版上，就接续出现出价回购第十五号报纸的两则广告，^⑥ 可证该期报纸是供不应求。其脱销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为袁祖志的“竹枝词”，因为除此之外，并无什么特殊。袁祖志后来夸耀，自“第十五号《申报》中创载《沪北竹枝词》四十八章，从此好事者更唱迭和，累牍连篇，迄今三年尤未已也”。^⑦ “创载”，或许就是暗示他与报馆的这番谋定，“未已”则表明是他开了风气之先。离首次刊载竹枝词半年之后，报馆收到的稿子已无法全部刊出，要经筛选“次第刊行，以公同好”，望“凡送稿已久而未及刊行者”，能谅解报馆“别有苦心”。^⑧

与竹枝词的自发酬唱不同，有组织的“雅集”是以古近体诗为本，依同题同韵而展开。最早出现是由报纸主笔蒋芷湘发起并组织的“消寒雅集”，共举办了四场。第一次“雅集”之后四天，其“实况”即公开见报，“从此海滨添韵事，却教吴下播新闻”。^⑨ “雅集”在新闻纸的流转中，大大扩展了其可见性。“争传海曲开吟垒，难得他乡合酒军”；“诸公尽属登瀛客，拭目争看锦绣文”。^⑩ “争传”“争看”，固不无夸张，但“雅集”引发反响也是事实。刊载“消寒雅集”第三天，“侣鹿山樵”给报纸呈上诗作，感叹“半年未遂瞻韩愿”，^⑪ 含迫切结交之意。“爱吾庐主人”深感诗作“清新风雅无不各擅胜长”，可惜是“未得一亲雅教耳”，于是“寄语词坛风雅士”，“几时相叙共论文”。^⑫ 慈溪酒坐琴言室芷汀氏的诗作，注明就是“遥和”：“异地相思常对月”，^⑬ 充满了欣羡和向往。香海词人因“屡读消寒雅集大著”，也就“学步邯郸”，寄奉诗稿。^⑭ 香鹭生居沪“几及十稔”，久疏于词曲，受“诸吟侯”酬唱的影响，“辄思效颦，戏为海上十空曲”。^⑮ 自此之后，诗歌传唱也就有了新的方式：“篇联珠玉寄邮筒”，“何妨交在有无中”。^⑯

① 鹤槎山农：《奉和梦庵主消寒雅集首倡原韵》，《申报》1873年1月9日（癸酉十二月十一日）。

② 《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5月16日（壬申四月初十日）。

③ 《申报》1872年5月18日（壬申四月十二日）。

④ 他自己的说法是，“余履兹土廿有余载，目见耳闻，日新月异”。袁祖志：《袁序》，见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页。

⑤ 该年1月的《上海新报》，就转载了他原发表在《教会新报》的《上海感事诗》。见《上海新报》1872年1月18日。

⑥ 一则是在一周之后，元利洋行“欲购申报”的告白，指明“今有各客号托办第十五号之申报”，需要翻印。[《欲购申报》，《申报》1872年5月25日（壬申四月十九日）]。此则“元利洋行”的告白，连刊三天，随即消失。这家洋行亦再无所见，至今未知其来历，祈行家教我。另一则出现在一个多月后，是申报馆直接出面，声言“出价拾文”回收某三天的报纸，第十五号报纸赫然其中。[《采买某日申报》，《申报》1872年7月3日（壬申五月廿八日）]。

⑦ 忤情生：《和沪北竹枝词》，《申报》1875年1月4日。

⑧ 《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10月17日（壬申九月十六日）。

⑨⑩ 侣鹿山樵：《遥和消寒雅集诗二律即次梦庵主原韵》，《申报》1872年12月28日（壬申十一月廿八日）。

⑪ 慈溪酒坐琴言室芷汀氏：《遥和消寒雅集诗次梦庵主韵》；莱申：《壬申长至日同人作消寒雅集于怡红词馆奉和大吟坛原韵》，《申报》1873年1月6日（壬申十二月初八日）。

⑫ 爱吾庐主人：《和梦庵主消寒雅集诗原韵》，《申报》1873年1月4日（壬申十二月初六日）。

⑬ 慈溪酒坐琴言室芷汀氏：《遥和消寒雅集诗并次梦庵主韵》，《申报》1873年1月6日（壬申十二月初八日）。

⑭ 《申报》1873年1月14日（壬申十二月十六日）。

⑮ 《海上十空曲》，《申报》1873年2月13日。

⑯ 评花馆：《题饭颗山樵山城倡和集》，《申报》1875年8月20日。

所发表的诗歌，不少标明是未定稿、未是稿，显露出一种随写随刊的创作方式，这当与报纸的即时性相关。^①但也不仅如此。“未是稿”之类，亦体现出诗歌口语传统的一种即兴特征，犹如诗人在现场竞斗各自的才气。报纸诗歌绝大部分称“录呈”，原因怕也在于此。“录”，就是表示“我手写吾口”，是对现场的实时模拟，于此还会刻意突出口头交流不可或缺的表演性^②。袁祖志注明他的《续沪北竹枝词》，是在“同人怂恿”下“醉后依数作此”^③。后来的蔡尔康等人，也不时标注其诗为“醉中”“醉后”或“酒后继和”。^④诗作与作诗的状态、场景相互指涉，生临其境之感。

报纸的酬唱就是真实的对话。“消寒雅集”第四集原定是为送别蒋芷湘回杭州，却因天公不作美而未实际成行，最终是在报纸上“不辞风雨得开筵”^⑤。虚拟的也就是现实的。于此看，葛其龙把“白桃花吟社”的“唱和”，与自己在狮岭潮音寺与友朋聚合相提并论，^⑥就不让人意外。“酬唱”唤起共有的精神气质，也互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所以，“旗鼓何当张一军”，“醉扛健笔张吾军”^⑦，成为他们的一种社会向往。他们察觉到原有的群体差异和界限在洋场已经模糊，却又无新的标尺来衡量眼前的变化；他们甚至缺乏一种新的指称，来区分和标识“我们”和“他们”、圈内人和圈外人、社会阶梯的“上”和“下”。^⑧恰是因了报纸之力，“雅集”使之罗织成“军”，从而既被汇入《申报》“谋业”之网，也用自己的手和笔生产报纸的网络。报纸的遥望与实际的谋面，纵横交错互为繁衍，“在千里百里而遥有新知故知之别”。^⑨“遥和”“异地”“诸君”“江南”“海外”等等的称述，与“我”“你”“这里”“那里”的标示一样，在报纸的运作中，既分开彼此，又连线成片。他们以情感表达和叙事实践，摸索着重构群体的关系和认同：“报纸再现我们使用自己五官的激情，并由此把外部世界转化为自身的肌体”。^⑩就在“雅集”开疆拓土的朗朗声中，报纸售价上涨了两文^⑪。

二、丰标宜领繁华世，清格休忘本色身^⑫

人是通过身体感知并拥有世界的。^⑬当接触到一种新环境或新媒介时，“身体”关联之“网”就会波动，身体所关联的“节点及其链结之网”，会铭印在人们的感知系统内，影响他们的身体预感。^⑭这首先带来麦克卢汉式的“延伸”，让人体验到一种新的“现实感”，一种新的思维认知及其编码象征。^⑮早期《申报》的大部分竹枝词，就是因此而开花结果。作为一种诗歌形式，竹枝词说不上新，更非其所创；但《申报》竹枝词关涉的所见所闻，却确属前所未有的。按照诗人自己的表述，这些竹枝词的创作方式，是“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⑯那么，就让我们借用一张表^⑰，见识一下其“逍遥”之足：

① 花宏艳：《〈申报〉刊载旧体诗研究（1872—1949）》，第73—74页。

② 倪健：《有诗自唐来》，冯乃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8页。

③ 忏情生：《续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18日（壬申四月十二日）。

④ 鸳湖隐名氏：《续洋场竹枝词》，《申报》1872年9月18日（壬申八月十六日）；缕馨僊史：《初九日订为消寒之宴二迭剪淞病旅韵奉简诸同社》，《申报》1875年1月15日；慈溪李东沅芷汀甫：《敬和吴兴赵忠节公绝命诗原韵》，《申报》1872年10月12日（壬申九月十一日）。

⑤ 龙湫旧隐：《消寒第四集诸同人公饯蘅梦庵主口占二律即以赠别并索同人赐和》，《申报》1873年1月18日（壬申十二月二十日）。

⑥ 龙湫旧隐：《白桃花吟社倡和诗并序》。

⑦ 蘅梦庵主原倡：《消寒雅集唱和诗》，《申报》1872年12月25日（壬申十一月廿五日）。

⑧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⑨ 昆池香海词人：《岁暮怀人诗八首并序》，《申报》1873年4月19日（癸酉三月廿三日）。

⑩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4页。

⑪ 《本馆告白》，《申报》1873年2月25日（癸酉正月廿七日）。

⑫ 萍寄轩主：《和梦庵主人红梅原韵四律呈请删正》，《申报》1873年1月10日。

⑬ 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页。

⑭ 彼得·艾迪：《移动》，徐苔玲、王志弘译，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99—100页。

⑮ 维兰·傅拉瑟：《线面》，韩晓强译，载韩晓强主编：《走向媒介本体论：欧美媒介理论文选》，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4年，第29、30、33页。

⑯ 城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9日（壬申六月初四日）。

⑰ 此表为张天星所做，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第259页。

表 1 1872—1874 年《申报》所载歌咏物质文明诗歌举例

诗歌	期号	歌咏物质文明之内容
沪北竹枝词（22 首）	1872. 5. 26	蒸汽机磨坊、马路、大自鸣钟、自来火等。
上海小乐府（4 首）	1872. 8. 2	电报、西洋镜、气球、机器。
洋场咏物诗（4 首）	1872. 8. 12	马车、地火、电报、轮船。
洋场咏物词四阙	1872. 9. 4	地火、电报、马车、轮船。
续沪北竹枝词（20 首）	1872. 9. 29	马路、轮船、地火、报纸等。
咏物旧作四首	1873. 3. 2	自鸣钟、寒暑表、显微镜、自来火。
上海洋场四咏	1873. 4. 19	轮船、马车、地火、电报。
沪城杂咏八首	1874. 1. 21	招商局、自来火、气球、火炮、电报、《申报》等。
洋场竹枝词（30 首）	1874. 4. 27	洋房、轮船、马车、洒水车、照相技术、大桥、花园、大自鸣钟、电报等。
沪游竹枝词五十首	1874. 6. 11	轮船、怀表、电报、洋楼、自来火、马路等。
沪城口占仿竹枝词二十首	1874. 11. 26	港口、马路、马车、《申报》、升降大桥、西洋镜、洋房等。
续春申浦竹枝词（20 首）	1874. 11. 4	江南制造局、方言馆、照相技术、西洋镜、升降大桥、煤气灯、天气灯、动物园等。
续春申浦竹枝词（10 首）	1874. 12. 1	蒸汽机磨坊、大自鸣钟、电报等。

实际涉及的远不止这些，洋场的各种新景观，如消防队^①、拍卖^②、市容^③、会审公廨^④，以及他们正为之出力的新闻纸^⑤，甚至包括洋人们的住、吃、喝、妆扮、上教堂乃至肤色，^⑥ 均被一一录入诗中。

这样的竹枝词，相信是报馆所乐意看到也是其着意要推动的。《申报》自诩是让人“不出户庭而知天下事”，^⑦ 实际所向，乃是他们欲人所知之“天下”——上海这个“中华一大名区”；^⑧ 其尤为突出的是“奇巧便利之事，日出不穷：如创造码头，以便运载；创造地火，以便行人；车样翻新，轮蹄征逐……电缘通报，遐迩音书，捷于邮传”，“近来又有自来水之制，其日新月异，正无已时”。^⑨ 在报纸上开了头炮的袁祖志之竹枝词，显然与报馆的这种意向相通。追逐新颖本就是报纸的本性，更不必说其时的上海，有着“出城便判华夷界”^⑩ 的实际比照。《申报》勾勒的“中华一大名区”与《竹枝词》描画的“洋场情形”，几乎就是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复制。如此之契合，不可能是偶然。

看一下瑶山渔隐。他“久慕申江风景”，“初到洋场”就急切去观看煤气灯自来火。“灯管如树，灯炬如莲”令他激动不已，“随占一联”，即送报馆请求赐对。^⑪ 久慕、观灯、投稿，一连串环节如行云流水，显得很熟络。如果事先对报纸没有相当的接触和了解，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及彼，不难推想，“随处足逍遥”的诗人，是在经受着报纸的“日新月异”熏陶中，不断游动脚步追新逐奇。基于“客来海上见闻多”^⑫ 的竹枝词，其“亲身见闻”离不开报纸提供的视窗，报纸的“耳目所周”为其“现实感”定位。“偶将俚句补新闻，拟为春申扫俗氛”，^⑬ 正是道出了这样的意思。

“扫俗氛”便是辞旧迎新，“博采奇闻，万象更新”。^⑭ 蒋其章曾夸赞自己的《长崎岛游记》，“弥合柳州游记高丽图，经异域风土志之笔墨而成”，故而是“创格”，是“奇文”，^⑮ 这不也正是《申报》这些竹枝词的基本面貌和风格吗？据研究者的统计，从 1872 年到 1890 年，《申报》发表的直接以洋场为题的竹枝词，就

①⑥⑫ 《沪北西人竹枝词》，《申报》1872 年 5 月 29 日（壬申四月廿三日）。
② 《续沪北西人竹枝词》，《申报》1872 年 5 月 30 日（壬申四月廿四日）。
③ 《续沪江竹枝词二十首》，《申报》1872 年 9 月 28 日（壬申八月廿六日）。
④ 清溪月圆人寿楼主：《申江竹枝词》，《申报》1872 年 12 月 11 日（壬申十一月十一日）。
⑤ 邛江以湘：《沪游竹枝五十首》。
⑦ 《本馆告白》，《申报》1872 年 4 月 30 日（壬申三月二十三日）。
⑧ 《议建铁路引》，《申报》1872 年 5 月 2 日（壬申三月二十五日）。
⑨ 《论上海今昔情形》，《申报》1881 年 12 月 10 日。
⑩ 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 年 5 月 18 日（壬申四月十二日）。
⑪ 《新出对句》，《申报》1873 年 1 月 9 日（壬申十二月十一日）。
⑬ 城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 年 7 月 9 日（壬申六月初四日）。
⑭ 《采访新闻启》，《申报》1872 年 5 月 29 日（壬申四月二十二日）。
⑮ 小吉罗庵主：《长崎岛游记》 蕲梦庵主附跋，《瀛寰琐记》1872 年（壬申十一月），第二期，上图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据库。

多达 1089 首。^① 现代报纸刊登如此大量描写租界上海的竹枝词，在历史上当属首次，从而为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开拓出全新的题材和景象。“租界”“洋场”之类的称呼，也正是因印刷报纸的广泛流传^②，铭刻下新的认知和记忆，成为当时乃至日后认识上海的基本视角。“多少新词唱竹枝”，是现象之新，感知之新，表达之新，也是传递及其显现之新。

感知尺度在空间上的扩展，又势必使既有的身体“预感”受到牵扯：扩展是即时的、向前的；铭刻在身的“感知链接”是过去和先在的，是历史继承。如果心智的连续性是理解自我历时持存的关键，^③ 那么，空间感知偏向必然引发心智的断裂，重新调整和接续就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海滨订心知”^④ 的“消寒雅集”。“心知”是交心，是“言志”，亦即“发抒怀抱”。^⑤ “海滨订心知”，由“海滨”而起，因“海滨”而需要“订”。那么，“订”的是何种“心知”呢？

第一集以“梅花”起题。梅花清骨高节，绽放严寒，一贯是雅士骚人比兴诵吟的喜好对象，但这种喻象和寓意，与 1870 年代的上海“夷氛”格格不入，反倒见出其命题未必完全是因订交的时令（长至日）而起。第三集题咏的是“雪和尚”“雪美人”，其题旨之意，显然与“梅花”征象完全相通。咏物之作，大率意不在物，而是“借物以寓性情”。^⑥ 从一干诗人的争相表白来看，他们或者以“一枝艳出”^⑦，“高格孤标”^⑧，“品格孤高”^⑨，“独留清节”^⑩ 为标榜；或者以“心地清凉”^⑪，“独随寒月”^⑫，“和月伴梅花”，“洗钵听夜月”^⑬ 而自励。

很明显，这与其说真正被重复的是过去的内容，还不如说恰恰是抹去了所有实质性内容的姿态本身。^⑭ 古近体诗在韵律格式上的严格和一致，以及在雅集中的同题酬唱，使得“订心知”在形式上有了一种共同基础。身在“海滨”的诗人，通过这种形式、节奏和意象的不断重复，敞露其共同的“怀抱”，展示出“孤客”所具有的一种同一。因此，无论是“感物”还是“怀人”，“消寒雅集”的酬唱都是与“我”相关，是关于有着一致、稳定的人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和“我们”。这与竹枝词不同，后者是外在的，源于“客”在“海上”的见闻。

《消寒雅集》的第二集，正是从另一个方向为此做了进一步补充。该集以《牧斋外集》抄本为题，或许是缘于该遗存书稿的珍贵。倘若因书及人，从该书作者钱谦益在世代之变中的反复多变气节不存，切近到租界上海的华夷之辨，本可触碰到自身的境遇，生出现时的撞击。然而，参与酬唱的诗人们，几乎都是专注于钱的生平，为之晚节不保、反侧贪鄙而惋惜或不屑。^⑮ 诗人们无不以评鉴者自居，居高临下而感叹：“今观外集益叹惜”^⑯。这种谴责和惋惜交杂的浮泛声调，远不及咏梅叹雪之类，还存有一种以物为托的真情，但诗人们那种挺立道德伦理高位的姿态，与之完全一致。他们不是在咏《牧斋外集》，而是以之为镜，反衬自己的高洁和坚定。

① 花宏艳：《〈申报〉刊载旧体诗研究（1872—1949）》，第 87 页。

② 王尔敏：《英人美查兄弟与中国口岸通俗文学之生机》，载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16—217 页。

③ 巴里·丹顿：《自我》，王岫庐译，丁三东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 69 页。

④ 蘅梦庵主原倡：《消寒雅集唱和诗》，《申报》1872 年 12 月 25 日（壬申十一月廿五日）。

⑤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开明书店，1947 年，第 3 页。

⑥ 沈祥龙：《论词随笔》，转引自袁行霈：《寄托——以美人香草为中心》，载刘柏林、胡念远编：《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 页。

⑦ 蘅梦庵主：《红梅八律消寒第一集》，《申报》1872 年 12 月 27 日（壬申十一月廿七日）。

⑧ 云来阁主：《红梅八律消寒第一集》，《申报》1872 年 12 月 27 日（壬申十一月廿七日）。

⑨ 懒吟仙史：《红梅八律怡红词馆消寒第一集》，《申报》1872 年 12 月 31 日（壬申十二月初二日）。

⑩ 啖华阁主人：《恭和大作红梅四律原韵即请郢正》，《申报》1873 年 1 月 7 日（壬申十二月初九日）。

⑪ 鹭洲诗渔小园：《咏雪美人》，《申报》1873 年 1 月 23 日（壬申十二月廿五日）。

⑫ 仪徵下雨帆维城：《咏雪美人七律四首》，《申报》1874 年 2 月 2 日。

⑬ 梦蕉居士：《咏雪和尚》，《申报》1873 年 1 月 23 日（壬申十二月廿五日）。

⑭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 114 页。

⑮ 分别见龙湫旧隐：《书钱牧斋外集后》，蘅梦庵主：《读牧斋外集题词》，载《申报》1873 年 1 月 11 日（壬申十二月十三日）；前人：《钱牧斋外集题词》，鹭洲诗渔小园：《题虞山外集》，《申报》1873 年 1 月 25 日（壬申十二月廿七日）；梦游仙史：《题钱牧斋外集消寒第二集》，《申报》1873 年 2 月 27 日（癸酉二月初一日）。

⑯ 龙湫旧隐：《书钱牧斋外集后》，蘅梦庵主：《读牧斋外集题词》，载《申报》1873 年 1 月 11 日（壬申十二月十三日）。

如果回归性是诗性的特征，通过重复、对仗、韵律、修辞等等导向作为文本的文本，^①那么，这两种诗体的回归性，是导向作为诗人之人。近体诗是寄寓在精神之我；竹枝词是洋场存身之我；前者宣示诗人内在品格和情怀的一体，后者则是诗人与暂且存身的环境面对面。前者通过用典，以示世代传承的文化之“我”；后者依托见闻，以显游走“夷场”的肉身之“我”。由于前者是以往的知识和精神养料之凝结，后者是洋场现实的即时生存，就导致前者有能指而缺乏所指，后者有所指却无相属之能指，故只有通过两种不同的“时间”——过去和当下而拼接一起。基于主体只能是存在于一个单一意识之流的经验中^②，身处上海租界的文人，就这样通过“向实践的生活提供想象的支撑点”，“向想象的生活提供实践的支撑点”^③，以拼合起一个完整的自我。这也就说明，身在洋场而精神上滞留于过去的“诗人”，是在混乱中被“带入甚至越过事实上的现在”而进入现在的。他们除非与“周遭人与物的共同存在进行新一轮的沟通协调”，否则就会因无法有效与场景沟通协商而被困在其中^④。《申报》雅集的这两种诗体，正体现出此种“沟通协调”的努力，晚清上海文人在文本中展开的在世，一个可以居住的世界：^⑤“生平与俗异咸酸”，“逝波岁月何能挽”，“幸与骚坛联末坐，时时盥诵报瑀词”。^⑥看似难以相容的两种诉说，构成了一个不能相融又无法分离的关联体，互为贴补又互为抵消。这样一种因“海滨”而唤起的内外“对视”和对话，必然使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框架发生游移，构成这批文人其时特有的“新”视野。由此也就证明了下面的这个说法：抒情是一种文类，一种“情感结构”，也是一种史观的向往。^⑦

由于“雅集”是“集”在报纸的版面上，报纸在使之展开的同时，也消除了其历史厚度和现实质感，成了只供观赏的“词语的肉身”。^⑧报纸“雅集”以身体缺席为前提，打破了交流的空间限制，在延伸人的感知的同时，也使诗词唱和成为无法亲身在场的报纸“展演”。^⑨于是，这种以“媒介为导引”的“准人际互动”，^⑩使得本为“交往”的雅集变成了关于“雅集”的交往。报纸居间调节着人们的眼光和行为：诗歌既指向诗人，同时也指向阅读者。一方面，“诗词”作为肉身之分“身”，任人隔空观赏；另一方面，出于共同的经历，诗歌又激发出“肉身”参与倾说的欲望。“词语的肉身”与“肉身”就这样随着报纸的滚动彼此映射，主与客轮回交替，此伏彼起：“既参加表演，又成为讯息”；^⑪既目睹“洋场”体验，又指引体验“洋场”，共同操演着感知与言说的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实践。报纸“视觉的一致性”，由此就逐渐生成了一个“不变的流动体”。^⑫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报纸像帕克说的，成为记录、连接、交流和组织城市生活的一种流行文学形式。^⑬

三、建骚坛于沪淞，申报纷驰^⑭

进入1873年上半年，《申报》上的诗歌在增加，^⑮诗人也在增多；竹枝词所纪之“风土”，也从洋场到了

① 温弗里德·诺特：《媒介中的自我指涉：符号学框架》，载温弗里德·诺特、宁娜·毕莎娜编：《媒介的自我指涉》，周劲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② 巴里·丹顿：《自我》，王岫庐译，丁三东校，第97—98页。

③ 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第5页。

④ 文森特·科拉彼特罗：《自指性文化中的扭曲、虚构和揭示：难以抗拒的真实之力》，载温弗里德·诺特、宁娜·毕莎娜编：《媒介的自我指涉》，周劲松译，第36页。

⑤ 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

⑥ 昆池钓徒杨文斌：《岁暮感怀二律即次蕲梦庵主元韵》，《申报》1873年4月7日（癸酉三月十一日）。

⑦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6页。

⑧ 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第4页。

⑨ 正是因此，就有读者因与槎上山人“谋面无由”，直接要他将籍贯和地址“刊入申报，以便函询与居”（《访友来书》，《申报》1875年1月7日），方便约定见面。

⑩ 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5.

⑪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第25页。

⑫ 布鲁诺·拉图尔：《视觉化与认知：用眼睛和手来思考》，吴啸雷译，载马丁·杰等著，唐宏峰主编：《现代性的视觉政体》，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5—46页。

⑬ Robert E. Park,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9(3), 1923, p. 273.

⑭ 《篆香老人赠小吉庵主人序本馆附启》，《申报》1873年12月25日（癸酉十一月初六日）。

⑮ 据我粗略统计，1873年的1—6月，《申报》共发表各种诗词约253首（全年共348首），比1872年5—12月多出100多首。

“鉴湖”“甬江”“西湖”与“日本”。^① 引人注目的是，像“消寒雅集”那样由报馆组织的酬唱不见了，大多是由某人原倡，数人相和，好似一个个小组团^②式的自发活动。

这表明更多“骚人韵士”接纳了报纸。豫园开“菊花大会”，侣鹿山樵“窃思必有”观游诗词在报中出现，不料半月过去动静杳无，就动手“勉成四绝，欲抛砖引玉待巨制”。^③“窃思必有”，透露出报纸刊登此类应景“佳咏”已是惯例，他们也养成了这样的期待。洛如花馆主人腊月回乡“春暮”而回，到沪便是“翻阅案头申报”，一眼看到诸友在正月里发表的诗作，就赶忙把自己的竹枝词送往报馆。^④ 读报与投稿，成为文人的日常生活。

报馆的地位因此凸显。“贵馆握江淹之彩笔，携李贺之锦囊。鸡林贾客，愿易名篇；凤诏诗仙，争钞杰句”。^⑤ 撇除那些虚言浮笔，却也显露文人委身报馆这一“翰墨之场”的几分实情。“建骚坛于沪渎，申报纷驰”，^⑥ 报馆首任主笔蒋芷湘得擢为“骚坛”之领袖。“自是捷才推蒋诩，一编日日读奇文”，^⑦“编”是核心，是编辑稿件也是编织人。蒋因“编”联起友朋网，保证了稿源和读者。“新闻储史料，余力筑诗城”，也让蒋的后继者，如钱听伯、袁祖志、何桂笙等“遥驰海国名”。^⑧ 龙湫旧隐虽非主笔，只因其“所著诗文，刊入记报者甚夥”，同样获得“独树骚坛帜，高谈仰博文”^⑨之崇，遂跻身“名流”^⑩。报纸上的“露面”，带来了“声名”；报纸的“声名”，又转化为实际的威望。

“雅集”的意涵也就发生变化。“必合道艺之志”的“为社”之规^⑪不再适用，展示、传扬、留名成为重要考量。出于苏州女诗人之手的《潇湘八咏》被抄送报馆，意在“以见吾吴文墨之盛，即巾幗亦娴咏如此”。^⑫ 从日前举办的“同人酬唱新词品题”中，选出最佳者录呈报馆，是为这一段“艺林佳话”^⑬不被埋没。沪渎廊公写的“劝嫁文”已经见报，继而送来“怨妇篇”“再恳登报”。过了个把月，又将新作“怨妇咏八首”递呈报馆。据说还有人把同一诗作两番三次送来。^⑭ 更典型的是“醉里信缘生”，他的“致竹卿书一篇，又都门新竹枝词十六首”在被报纸刊发时搞错了署名，^⑮ 但不直接要求更正，而是“再出四诗”求发表以代“正名”。自 1875 年开始，向报馆写信询问自己稿子着落者不少^⑯，报端名姓之重可见一斑。以此见，自行组织的唱和，事后都将诗稿送报馆，也就不令人奇怪了，甚至不排除就是为报纸而聚而唱。

“一编日日读奇文”，使得“奇文”须跟上“一编日日”之节奏。这是报纸的生产时间，也是“新报之

① 白华峰跋：《鉴湖竹枝词》，《申报》1873 年 4 月 22 日（癸酉三月廿七日）；白下痴道人小池：《甬江竹枝词》，《申报》1873 年 1 月 17 日（壬申十二月十九日）；怀新轩：《西湖柳枝词》，《申报》1875 年 11 月 18 日；岭南随俗之人：《日本竹枝词》，《申报》1873 年 11 月 22 日（癸酉十月初三日）。

② 比如鹤榭山农清明祭扫返棹过白鹤寺而感怀，龙湫旧隐等三人即次韵而和；小游仙为春日生情，鹤榭山农等四人即题相和；闲云草堂主人“客中偶感”，囊萤室主人随声和之；后者又回之七律一首，闲云草堂主人即声应答。分别见鹤榭山农：《清明祭扫返棹过白鹤寺感怀》，《申报》1873 年 5 月 8 日（癸酉四月十二日）；不愁明月尽馆主人小游仙：《春日即景》，《申报》1873 年 5 月 13 日（癸酉四月十七日）；闲云草堂主人：《客中偶感唱和诗》，《申报》1873 年 5 月 14 日（癸酉四月十八日）。

③ 侣鹿山樵：《咏菊》，《申报》1872 年 11 月 29 日（壬申十月廿九日）。

④ 茗溪洛如花馆主人：《续春浦竹枝词十章》，《申报》1875 年 6 月 17 日。

⑤ 滇南香海词人：《洋场咏物词四阙调倚沁园春》，《申报》1872 年 9 月 4 日（壬申八月初二日）。

⑥ 《篆香老人赠小吉庵主人序本馆附启》，《申报》1873 年 12 月 25 日（癸酉十一月初六日）。

⑦ 梦游仙史：《消寒第一集即席次梦庵主韵录请同社诸大吟坛绳正》，《申报》1873 年 1 月 6 日（壬申十二月初八日）。

⑧ 李士棻：《简钱君听伯、袁君翔甫、何君桂笙，并乞和章》，载李士棻撰，唐清莲、唐德正注：《天瘦阁诗半注》，第 95 页。

⑨ 浙西小浣花堂饭颗山樵：《续山馆怀人诗六律》，《申报》1875 年 6 月 12 日。

⑩ 泉唐啸岑士：《地震书感和龙湫旧隐韵》，《申报》1872 年 9 月 30 日（壬申八月二十八日）；东江散人：《地震书感和龙湫旧隐韵》，《申报》1872 年 10 月 11 日（壬申九月初十日）。

⑪ 方九叙：《西湖八社诗贴序》，转引自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07 页。

⑫ 吴门倚稿女史顾素龄：《潇湘八咏》，《申报》1872 年 12 月 3 日（壬申十一月初三日）。

⑬ 《新雁四首》，《申报》1872 年 12 月 27 日（壬申十一月廿七日）。

⑭ 沪渎廊公：《怨女赋》，《申报》1875 年 5 月 22 日；沪渎寓公：《怨女八咏》，《申报》1875 年 6 月 25 日；《乙亥孟夏雨窗有感小得仙事·本馆附识》，《申报》1875 年 7 月 12 日。

⑮ 醉里信缘生：《无题四律》，《申报》1872 年 12 月 6 日（壬申十一月初六日）。

⑯ 《答海昌饭颗山樵来书》《复鸳湖映雪生书》《复古吴抚松馆主人书》《答洗桐生》《答书》《答坐花醉月生书》，分别见《申报》：1875 年 6 月 1 日、6 月 8 日、8 月 11 日、11 月 11 日、11 月 24 日、12 月 28 日。

事，今日之事”^①所应然。“报以日记，新闻也”；“新报者，新有某事则记之”，^②似已成一种共识。这要求诗歌像新闻那样来创作，一种信息化、符号化，且只具短暂价值的文化^③也就飘然而起。“聚星吟社”“四月六日诸同人钱春于太乙莲舟”，其中两位迟交一天，其诗作未及一起汇送报馆，于是赶忙补送，并恳求“速登报中，以塞友人之责”。^④迟一天就等之不及，且补交的诗稿不“速登”就难“塞责”，足见报纸的出场重于实际的在场，而且是争分夺秒。“征诗如征兵，邮筒急星火”^⑤，急的是报纸的刊期，追的是诗歌创作的速度。

既求见报率，又求时效性，带来1873年下半年之后诗歌的几个变化：第一，古近体诗增多，竹枝词减少；^⑥第二，“抒怀”者越来越少，卖弄者越来越多；第三，无聊冶游成为酬唱之趣，怀妓诗、狎妓诗、香豕词，乃至贺冥婚诗不绝于缕。题沈文兰校书之“小影”，“一时和者至二百数十首之多”，就见其一斑。^⑦甚至有公开互相挑逗奉和^⑧，直如嬉笑打闹。“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么？那一班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个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最可笑的还有一班市侩，因为艳羨那些斗方名士，出了钱叫人代作了来，也送去登报。”^⑨吴趼人的这番尖刻之讥，无法确定因《申报》而起，但未必就没有《申报》的影子。他所不齿的弄虚作假，在《申报》“雅集”中同样存在，如“闺秀诗为好事假托者居多”，“以笔墨乞灵于巾幗者也”。^⑩失落了真情，诗歌就是一种技艺；以“消遣”而不是“沉思”的方式与诗歌相遇，诗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消费品，^⑪“彼唱此和，喋喋不绝”，“互矜风雅”，“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⑫自就在所难免。

当然，不是没有质疑。1873年初，有“小辋川主人”来信，要求“劝禁刻绮语淫词”，将“此等诗词即为焚毁”，以免贻害少年子弟。^⑬两天后，“风尘下士”跳出反驳，抨击前者有失公正。报纸实际上一直在关切国计民生，偶有一点“寄怀风月，偶蹈绮语之戒者”，“细绎其旨”，也“无不曲终奏雅”，“一言以蔽之，则思无邪而已”。^⑭不管所持意见为何，论者都是把报纸纳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谱系来辨认。此种以古律今的报纸认识，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⑮这符合中国人的“文以载道”之想象，但也就不可能意识到，当旧媒介——比如诗词口头交往——成为新媒介的内容时，就必然转化为一种新的面貌和环境。^⑯这也让报社抓住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少见地在风尘下士文后添加编后语：“此稿为本馆置辩，本不欲付诸梨枣，以为口舌之争，细思其言，实系有理。”^⑰

文人们不得不在报刊的新世界中摸索着自我再定位，典型的表现就是笔名的使用。有学者检索了《申报》来信中的108个署名和《循环日报》中的9封来信署名，约占70%是隐喻式而不是个人事实信息为主。它们或以出世者自居，像居士、江南吏隐等等；或突出自己的纯洁高雅，如鸳湖映雪生；也有的表示某种社会态度，如京口振靡子、吴淞江洗耳人以及持平叟。这与《北华捷报》的来信者常用的“进步”“正义”和

① 《申江新报缘起》，《申报》1872年5月6日（壬申三月廿九日）。

② 同文生：《来札》，《申报》1875年11月18日；珠街雅卿甫胡熙：《日报文仿制义礼》，《申报》1875年3月17日。

③⑪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116页。

④ 《钱春诗附跋》，《申报》1873年6月12日（癸酉五月十八日）。

⑤ 缕馨仙史：《初九日订为消寒之宴三叠剪淞病旅韵奉柬诸同社》，《申报》1875年1月15日。

⑥ 据我粗略统计，1872年发表诗歌总数是100首，竹枝词为23首；1873年诗歌总数是348首，竹枝词为12首；1874年诗歌总数为197首，竹枝词是14首；1875年诗歌总数是442首，竹枝词只有4首。

⑦ 《申报》1875年8月5日。

⑧ 《申报》1875年1月23日。

⑨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回“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2—63页。

⑩ 《申江风月》，《申报》1873年12月8日（癸酉十月十九日）。

⑫ 雷瑄：《申报馆之过去状况》，载《最近之五十季》，上海：申报馆，1922年，第117页。

⑬ 小辋川主人：《劝禁刻绮语淫词议》，《申报》1873年1月18日（壬申十二月二十日）。

⑭ 风尘下士：《辨小辋川主人劝禁淫词来书》，《申报》1873年1月20日（壬申十二月廿二日）。

⑮ 在1873年2月15日的《申报》上所刊载的《申报馆赋》中就说：若然使申报各爱其新，则借以劝惩；劝惩扩申报之新，则布一处，可至各处而警心，谁闻而不乐也。可见新报“劝惩”，是一种流行的看法。

⑯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27页。

⑰ 小辋川主人：《劝禁刻绮语淫词议》，《申报》1873年1月18日（壬申十二月二十日）；风尘下士：《辨小辋川主人劝禁淫词来书》，《申报》1873年1月20日（壬申十二月廿二日）。

“公正”之类形成鲜明对比。^①

报纸的笔名是私域与公域的交叠，既是面具也是标牌。从社会学角度，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文人们要在非人格化的报纸交往中显示自己的人格。正如桑内特指出的，这里面蕴藏着一种以体现出来的人格特征来衡量社会行动本身的欲望，其目的是显示自己是个真诚的社会行动者。社会行动的好坏在于执行这种行动的人的人格，而不在于行动本身。^② 文人们以此昭告世人也是安顿自己：一方面表示没有与根本的方向感相违；另一方面又试图纳入新现实中的某些特殊东西，以与自己的祖先有所区别，从而化解因报纸可能引发的“自我认同框架”冲突。^③

问题是，文人们常常是多个笔名选择性采用：古近体诗所用的与竹枝词不同，诗歌的署名有别于文章。袁祖志的“忤情生”“海上逐臭夫”只出现在竹枝词中，“苍山旧主”则是古近体诗的专有。蒋芷湘的“小吉罗庵主”用于文章，“蘅梦庵主”为诗歌而设，翻译小说则称“蠡勺居士”，编辑《文苑菁华》用的是本名。看上去这些不同的笔名都属于特定的个人，是“一生多”，但实际上并不能还原为“一”。它们既无内在关联，也无可以比衡的标准，没有尺度就没有一体。当文人们依照自己的趣味和兴致，半认真半游戏地拨弄着各种名号时，反而见出其人格的破碎。难怪有人在报纸上为某一特定事件征稿，指明应征者必须用真名而不可署外号，^④ 以示认真和严肃。如果人们的日常互动，是一种交互性表演，在特定场景中依据特定的剧本扮演合适的角色，^⑤ 那么，在笔名上的跳来跳去，正说明原有的“剧本”——角色所基于的信念系统，即人们应该如何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们身处其中的场合^⑥——在商业化报纸所构成的新场景中不再适用。

文人们本想以笔名的运用来驾驭报纸的写作，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报纸的版面及其内容由报馆所定而非作者所属，依据的是报纸特点和适应“四方阅者”的口味。版面作为一种功能性定位，与作者的关系是松散的也是偶然的：可以是约稿，大量是愿者上钩。这与书籍不同，后者是人书一体。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我”都是一个陈述的主体，书是其解读的对象，二者是不能分离的对应关系。“一编日日”的报纸关心的是版面不能开天窗，注重的是有人阅读，并不在意是谁填补了这一空白。这就好比孙玉声说的“词章补白”：“主任人”在送来的“词章”中，“择其格律谨严，可以供人一读者，选付手民，作为补白之用”。^⑦ 报纸撰稿者实质上就是“补白者”。倘若不同的笔名是一个人的同等化身，那么，同类的稿子出自何人，除了名号不同，并无实质性区别，都不过是报纸的写手罢了。因此，当文人们变着法子以不同笔名穿梭于报纸场景时，事实上是报纸设置的框框及对阅者的测想，赋予其出场和扮演角色的选择。只有首先符合报纸之需，方能获得自我的满足。既然如此，笔名的实际效用也就变味。无论文人们是如何标榜或珍爱，都不过是版面的资源和配置。文人们借助笔名以示自好乃至自立，表现出参与报纸公共写作的自主性，却也因此不知不觉堕入了报纸运转的轨道，成了一个在版面中飘来浮去有名无实的符号。这无意中会刺激发表欲，因为发表得多才不被淹没在众多的“补白”中；这也难免导致有意地投机取巧，因为只有投报纸之所好，才能获取“露面”的机会。

如此的报纸“雅集”——以商业报纸为中心经由机械复制而生产的“词语肉身”，自然不再是如地缘、情缘、师生缘一类的有机网络，也远离了“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瑟之乐，爰寓诸篇，而诗作焉”^⑧的传统风尚。他们看上去与 19 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有几分相似，因为后者也因社会和文化的急剧变动而不安和失望。不过英国诗人为的是纯洁的艺术缪斯遭受市场化、商业化的污染，是因为新兴工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与艺术的必要原则之间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振臂直呼，“我们的事业高尚深远啊，朋友”！^⑨ 反观

① Natascha Gentz, “Opinions Going Public: Letters to the Editors in China’s Earliest Newspapers,” in Antje Richter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Brill, 2015, pp. 913–916.

②⑥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第 12—13、39 页。

③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 41—42 页。

④ 黄宗起：《嘉定陆烈妇征诗启》，《申报》1873 年 6 月 19 日（癸酉五月廿五日）。

⑤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⑦ 海上漱石生：《报海前尘录·十四》，《新夜报》1934 年 10 月 9 日。

⑧ 方九叙：《西湖八社诗贴序》，转引自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第 307 页。

⑨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 年，第 50 页。

《申报》诗人，既没有努力坚持的永恒艺术，更不反感商业化报纸，倒是投身其中乐此不疲。他们或许也不无雪莱那一代人有过的“痛切彻骨的无助感”，但不是因诗人在市场自由面前成了“未被承认的”立法者^①，而是为如何在自由市场中获取自己的位置。他们的“自我”因报纸而舒张，亦因报纸的纷驰被销蚀：“也开笑口合时宜，傲骨居然一半移”。^②

到了1875年，报馆开始招聘专职记者，其对象不再是“骚人韵士”或“儒林丈人”，而是有了具体的职位要求 and 条件，并承诺“薪金”“从丰酌送”，^③一种新职业的模样开始浮现。同样从1875年开始，报馆发现了印书谋利之新径，并首次向文人征求小说排印售卖，王韬的两个作品赫然其中。^④三年后点石斋印书局出世，石印书籍大获收益，引致后来者竞相模仿。^⑤报馆在拓展挣钱的门路，也为文人们创造种种新的可能，其境况已远非1860年代可比。^⑥1870年代的文人对西式印刷技术及其行业的态度已不再抱持冷漠和鄙视。^⑦不久，龙湫旧隐葛启龙就会熟稔地一稿多投，而此前不久，他还兴冲冲高调奔赴顺天府应试；^⑧《申报》的新主笔何桂笙将收有学习新闻学的徒弟——周病鸳和高太痴，^⑨日后二人果然成为业中翘楚；成立于1882年的同文书局，亦将迎来入职其中的前翰林学士和举人、秀才们。^⑩

“四座宾朋同臭味，三生文字有因缘”，^⑪新式媒介的“因缘”，让“同臭味”的“宾朋”结交一体，也使之再回不到原来的“耕读之家”。西方的印刷报纸，让古老的“讲故事者”销声匿迹；^⑫东方的印刷报纸，则使文人脱出根基重辟生路。如果说，是“上海这种暧昧的环境吸引、培养和扶持着一种新的过渡性人格”，^⑬那么，正是报纸“雅集”为之启步。

结语：诗社之变相

“诗社之变相”，^⑭在《申报》创办五十年后对“报纸雅集”的这个评判，口气虽不屑，定性却真切：它的确非同往昔。

“变相”因报纸而起，使一个本与日常俗世相隔的文化精英之仪式，变成了一种开放的日常交往，一种观览的景观，一种可以谋利的资源，因此也重塑了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为。这改变了传统文人的习性也改变了其命运，使之在自觉和不自觉中熟悉并融入了印刷出版的新兴行业，开始向着主笔、访员、作者、编辑的职业文化人转变。“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江浙无赖文人”“洋场才子”之类的命名，正表明这是一群无可

①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第58页。

② 半痴道人：《右红梅花诗四律呈诸吟坛海正》，《申报》1873年1月2日（壬申十二月初四日）。

③ 《延友访事告白》，《申报》1875年7月5日；《觅请访事人》，《申报》1876年1月19日；《访请报事人》，《申报》1876年2月22日；《延请在天津访事人》，《申报》1876年2月26日；《延请访事人》，《申报》1876年3月16日。

④ 王尔敏：《口岸流风与小说文运之兴起》，载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的升降》，第262页。

⑤ 姚公鹤：《上海闲话》，吴德铎标点，第12页。

⑥ 在1860年代《上海新报》的招工启事中，需求最多的是木工、家政、市政建设以及洋场职员，其中职员职位的要求是“能通英语，读英国图书，写英国字者，兼能通中国书籍文理，并能工书法，通中国语言”。见何益忠：《从〈上海新报〉的招聘启事看开埠初期的上海社会》，《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5期。

⑦⑩ 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张志强等译，郭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1、140页。

⑧ 比如其《自来水》，刊于1882年9月17日的《申报》和1882年9月19日的《字林沪报》；《电气灯》见于1882年9月15日的《字林沪报》，1882年9月17日的《申报》以及1882年第188期的《益闻录》。

⑨ 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72—73页。

⑪ 龙湫旧隐：《消寒第四集诸同人公钱衡梦庵主口占二律即以赠别并索同人赐和》，《申报》1873年1月18日（壬申十二月二十日）。

⑫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载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5—118页。

⑬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7, No. 2, 1997, p. 420.

⑭ 雷瑯：《申报馆之过去状况》，载《最近之五十季》，第117页。

归类的新人。^①

“诗社之变相”，初显了一种文化之新相。这类似于埃德加·莫兰所说的，起源于大众媒介，并且与古典文化（宗教的和人文主义的）和国家（或民族）文化有冲突但不对立，有交集而不被归化的第三种文化。它是世俗的、消费的，依照媒介的规则批量生产和大规模传播，面对所有社会大众的“产业文化”。^②就晚清《申报》的情况而言，我更愿意称之为“报刊化文学”。“诗社之变相”就是这样一种新文化之发萌，发动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通俗文艺”之生机，^③为后来的城市小报和消闲刊物做出了示范，预制了土壤，培育了人才。

这当然是一种现代文化，不过其现代性主要不是平常所论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其全新的文化生产机制。援用弗卢塞尔的说法，这是一种通过“发表”，把本是精英内部的一种特有的“秘密”公开化，“专属性”的诗歌雅集转变为“通用性”的城市世俗文化的场景。在弗卢塞尔眼里，这样的一种“泄露”，是对文化的一种背叛；因为“背叛”，导致了社会的平民化和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印刷报刊的文本剥夺了以前的文字符号的秘密，“一张精英网络开始在世俗化的潮流上方形成，并追赶着世俗化的大潮”。^④一种带有社会普遍性的文化，是由商业公共媒体主导，基于市场的活力、受众的多样性和城市异质性等各种因素混合所致，而非来自固有的社会文化体制，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就世界而言，也是一种新趋势。^⑤由此可见，《申报》诗歌非但不是固有“文学”的一种沿续，相反是一种断裂，预示一种以印刷复制为条件，以市场规则为导向、以仿效城市生活为手法的新“文学”诞生。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必得托借一波又一波的报刊为骨架来做叙说，足以说明这一点。“报刊文人”也不是指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或小说的群体，而是以商业化报刊为支点，参与文化“背叛”同时背离原有身份的职业写手，是一批随着与信息产业紧密联系的文化世俗化而开始冒出的新社会主体。^⑥在这个意义上，“现代通俗文学”，实是“文学”之通俗化、平民化、生意化。亦即，传统“人文性”意义上的“文学”——辞章文法、礼仪交往、诗词歌赋、伦理道义等，在报刊和市场的交相冲蚀下，失去了“灵晕”，摆弄为买与卖的产品，不复是文人修为和德性的标志。“一身文武艺，售与市场家”，自然是经济第一，美学其次，或可说是因经济而美学。社会话语的基本秩序一旦改变了，历史永恒的支柱都会分崩离析；^⑦当“志于道”的文人天平逐渐向志于文字谋生一边倾斜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天文，以化成天下”的社会文化生态就受到侵蚀。与之相应，“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士，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⑧的“读书人社会”之败落，不过一个时间问题。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1872—1874），中国人启步走上报业报学领域，正表示着近代学术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⑨

究其根本，这也是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转折。“诗社之变相”显示出一种社会组织的新形貌。

① 用布尔迪厄的说法，这种分类出自“辱骂”的范畴，它不是根据客观特点加以识别，而是某种类别被赋予了一种共同属性。这种分类取决于施行者，如果他具有权力，其分类就能够确立。因此，分类不完全是认识问题，关涉到实践，也就是分类施行者的分类及其目的。[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普通社会学（第一卷）：分类斗争》，刘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22、24页] 尽管布尔迪厄是针对社会学研究，但同样启示我们，上述这些称呼还大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空间，仅仅将之作为一种确认的历史材料加以援引，研究者就有意无意地成为此种分类的共同施行者。

② 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第4、17页。

③ 王尔敏：《英人美查兄弟与中国口岸通俗文学之生机》，载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第215页。

④ 威廉·弗卢塞尔：《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周海宁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0、72、74页。

⑤ 这个观点主要来自埃里克·马塞。参见埃里克·马塞：《前言：〈时代精神〉的现实意义》，载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第7页。

⑥ 康在镐：《本雅明论媒介》，孙一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页。

⑦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基特勒论媒介》，张昱辰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1页。

⑧ 王氏家训，转引自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64页。

⑨ 王尔敏：《英人美查兄弟与中国口岸通俗文学之生机》，载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第211页。王尔敏所指的近代学术文化转折，重在报纸出版对于通俗文化的兴起的影响；我更在意的是报纸对文化流通空间的改变，尤其是突破了地域限制，具有了城市的乃至全国的尺度。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报业报学之崛起，恐怕后来的陈独秀不仅提不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想象。

它是以报刊为中心，而不是中国固有的以知识教育系统为界别的社会再造。社会存在于“各种有中介的人类相互关系之形式”^①的变化之中，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沟通形式的演化，促发社会状貌的重构。^② 背靠报纸而生的雅集——“诗社之变相”，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社会构成，预示着中国社会报刊化的开始——报刊成为社会架构的物质设施、组织条件及互动方式。历史告诉我们，此后中国的方方面面：政治宣传、社会运动、文化思潮，合群结党乃至日常交往，再无法与报刊脱嵌。康梁们以报通耳目而结群，办报办会之一体；“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学之争，随后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分化组合，无不以报刊为依托做旗门，又何尝不是一种“会社之变相”？^③ “变相”，不是与传统断裂，但传统的有机纽带在被报刊拉长的同时，无疑也被整薄修细了。^④ 信息运动的加速，必然造成社会群体构成和组织构造的变化。^⑤ 《申报》“雅集”为此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报刊的媒介化运作建构，是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一个重要动力，不能长期被视而不见，成了一种失落的现代性。

“当媒体与沟通技术改变之时，当表达可能性的技巧与细致感受改变之时”，尤其是当符码“再生产与储存的能力增长之时，便有可能产生新的结构”。^⑥ 晚清的报纸“雅集”已是一个证明。不过，就当下这一场轰轰烈烈人人卷入的“彼唱此和，喋喋不休”——数字“雅集”而言，这已是翻过去了的篇章。未来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晚清报纸与上海—江南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22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Newspaper “Gathering of Literati”: Initiating Modern Transformations for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Taking Early *Shenbao* as Example

HUANG Dan

Abstract: Yaji (“雅集”), or the “gathering of literati”, refers to the frequent exchanges of poems published by *Shenbao* right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Focusing on Yaji,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t reconfigured relationships among literati, brought forth new means of interaction that formed the public culture of newspapers at the time, and led literati to accept newspapers and the printing industry, thus beginning to deviate from previous life trajectories. These inquiries unfold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coupling between newspaper’s profit-making and literati’s friend-seeking endeavors; entanglement of literati’s “body” and “mind” as manifest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ancient poems and bamboo branch lyrics in newspape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ti’s habits to read and submit to newspapers, which promoted the fashion to “take pride in publishing on newspapers”. In accordance, this investigation argues that newspaper Yaji transformed cultural habits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and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general. It also midwived new cultur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mechanisms, which constituted a new form of society leveraging on the operation of newspapers as medium. Newspaper Yaji initia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s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late Qing Dynasty, marking the start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Shenbao*, Yaji, Late Qing Dynasty, Traditional Literati, Initiation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① 小威廉·H. 休厄尔：《历史的逻辑》，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3—204页。

②⑥ 玛格特·博格豪斯：《鲁曼一点通：系统理论导引》，张锦惠译，台北：暖暖书屋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170、384页。

③ 可比照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若依查尔斯·蒂利关于现代社会运动的标准，维新运动恐怕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会运动。（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④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第38页。

⑤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128页。